民族所的過去、現在及未來：黃樹民院士訪談稿

葉光輝 *

圖 1　訪談黃樹民院士（陳皓宇攝於 2024 年 07 月 30 日）

一、前言

這篇訪談資料稿是個人接受張珣所長託付，為了明（2025）年民族所七十週年所慶，特地訪談前民族所所長　黃樹民院士，請他談談他記憶中過去的民族所、所認知現在的民族所，以及對民族所未來發展的期待。整個訪談時間共計一小時 45 分鐘左右，當日（2024/07/30）整個訪談過程全程的錄影、錄音及照相，所有影音、影像資料的電子檔案皆保存在民族所博物館的視聽室中，以下是訪談錄音所謄寫出來的逐字稿件及其補充註解。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臺灣大學心理系暨研究所教授；email: ykh01@gate.sinica.edu.tw。

二、記憶中早期的民族所

葉光輝：

黃院士您好，非常感謝您願意接受訪問，如您所知道的，明年是民族所七十週年所慶，全所現在正逐步地訪談跟錄影民族所的前輩人物，希望透過訪談資料作為所慶的歷史材料。因為院士您跟民族所淵源很深，從以前到現在，您也擔任過民族所將近十年的所長，為民族所建立了很多良好的制度，也為民族所在院裡面的地位提升許多，您今天願意接受訪談，真的非常感謝。我們主要是想請您談一談，就是您眼中過去、現在跟未來的民族所。我們就先從您怎麼進到民族所？這個題目開始。

黃樹民：

謝謝光輝這樣的安排，讓我有機會跟大家談一談民族所的歷史。這個可以說大概是屬於民族所「舊石器時代的史前史」。我最早來民族所工作大約是 1966 年、67 年，那時候我在臺大人類系上唐美君[1]先生的課。唐美君教授那時候在做臺灣原住民的深入的民族誌調查。他知道民族所有很多早年日本人拍的照片，所以他希望能夠翻拍這些照片，就要我去當他的研究助理，到民族所把檔案找出來，然後一張一張翻拍，那是最早到民族所的時候。

那時候中央研究院還是非常偏僻的一個地方。荒涼、聯外也沒有什麼道路，有的路也都是很簡單，也沒有交通車。唯一一部交通車，是臺大到中研院的交通車，每天早上大概八點從臺大開車，開到中研院大概是九點半，因為那時候要穿過整個臺北市區，那部車就慢慢開。所以變成是我們那時候坐臺大的交通車到民族所，就變成一個很好的聊天的機會，大家在車上就可以談各種各樣的問題。

那時候的民族所還是在老的舊址，就是現在行政大樓總辦公室的地方，後來這個大樓就拆掉了。那時候的大樓呢，底下是研究人員的辦公室，二樓是陳列室、展覽室、圖書館這些。那時候的活動很多，因為那時是凌純聲先生當所長。他是一個胸襟

---

1 唐美君（1927 年 10 月—1983 年 8 月），浙江鄞縣（今浙江寧波）人，臺灣第一代人類學家。1970 年起擔任臺灣大學第四任考古人類學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直至 1976 年卸任。

非常開放，然後能夠接納不同研究議題的人，所以那時候民族所辦的很多活動邀請不同的學者來參與。比如說那時候曹永和[2]老先生也常來，還有鮑克蘭[3]女士。大家常有機會一起開座談會、一起聊天，變成一個非常融合的一個團體。即使大家研究興趣可能不太一樣、題目不太一樣、觀點也不太一樣，但是大家都可以坐下來聊聊天，就變成一個很多融合、交流的機會。那個時代可以說，大概是民族所的黃金時代。不只是我剛剛提到的這些學者，還包括了像劉斌雄[4]先生，他那時候是做數學人類學的，這個是非常少見的研究取向。

黃樹民：

我那時候來了一年，替唐美君先生拍攝這些標本。做完一年之後，李亦園先生就找我說：「民族所也很需要這種 part-time 的助理啊，你能不能來當兼任助理？」我就說可以啊，反正一個禮拜來一、兩次嘛。雖然當時坐交通車是很費時間，但還是蠻有意思的，所以就答應他來當助理。

那助理的工作是做什麼事呢？李先生一開始是要我去幫凌純聲先生先整理資料。我幫了一陣子之後，凌先生說他又找到他原來的助理。那後來李亦園先生就叫我去劉斌雄先生那邊當助理。主要做什麼呢？就看劉先生寫的文稿，因為劉先生主要的語言是日語，其實他最好的第一是日語，第二是英語，第三才是漢語／中文，所以劉先生寫的中文需要有助理幫他看過、順過。

有一次我在幫劉先生看他的文稿的時候，看到其中有一句話說：「原住民他們在

---

2 曹永和，臺灣歷史學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生於日治臺灣臺北州七星郡士林莊。國立臺灣大學榮譽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研究員、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以研究臺灣荷西統治時期與提出「臺灣島史觀」著名。

3 鮑克蘭 (Inez de Beauclair)，德國哲學家，後來在人類學中找到研究興趣，是在中研院民族所工作的第一名女性研究員，從 50 年代來到臺灣，一直待在臺北到 1981 年離世，對於臺灣早期的原住民族以及太平洋島嶼研究，都有深刻的鑽研。

4 劉斌雄（1925 年—2014 年 12 月），臺中后里的客家人，1957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民族所擔任衛惠林先生的助理，以卓越的日文能力協助衛先生進行民族所在蘭嶼的民族學調查工作，在蘭嶼蒐集親屬系譜資料的期間，讓劉先生思考了許多有關原住民的問題，後期繼續留在民族所從事親屬研究，是以親屬研究領域著稱的人類學家。曾擔任中研院民族所第四任所長。

男方到女方家要提親的時候會帶『等路』。」我說：「等路？」什麼叫「等路」？等候的等，走路的路。我就拿去問劉先生這個「等路」是什麼意思？他說就是臺語的「等路」，（臺語）直接翻譯（成漢語）。所以那時候就幫他做一些修改。我做了沒有多久後來就出國了。出國之後還保持跟民族所的聯繫，譬如所方要聘新人會要我替他們看一些申請案件或者升等案，或者辦活動民族所會請我來參加，所以跟所方就是有很多的聯繫。

三、協助規劃中研院的評審制度

黃樹民：

那真正比較正式的接觸是後來到 1989 年的時候。1989 年的時候中研院準備要做一些大的改革，成立一個叫做「學術諮詢總會」。那時候前院長吳大猷在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是找了許倬雲先生來負責。許先生就叫我也來，說：「我們一起來提供一些意見」，所以 1989 年之後我就比較常來，比較正式一點地參與企劃、規劃、討論。那時候臺灣還沒有那種比較嚴謹的評審制度，比如說有一些申請案件，或者一些期刊要審稿，或者一些申請案要審查，那時候還沒有這種所謂的「雙向匿名制」。所以我們那時候，1989 年之後院學諮總會才慢慢推動出來：第一要有客觀的評鑑制度；還有一些比如說雙向匿名，且盡量避免使用同一刊物的著作來做升等；還有對於迴避關係，好比說指導教授不應該審查他指導學生的論文。另外就是升等從助研究員到副研究員要用什麼標準來做評鑑？這些制度都是 1989 年之後慢慢有一套系統建立起來。那當然比較早的還有就是任期制，就是說所長、中心主任任期可以任多長時間，這個都是那時候慢慢建立起來。

然後那時候也發現有很多小問題。比如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 1989 年我們來做評鑑的時候，就發現在人文社會科學這邊有幾個不同的單位都想買同樣一套東西叫《淡新檔案》。《淡新檔案》當時很貴，兩千萬、三千萬的樣子，近史所要買，臺史所當時是籌備處也要買，大家都要買，每個單位都要買。我們那時候才提出一個建議，有很多東西可能不用重複（買），因為你圖書館有一套大家可以共用，不必架屋疊床，一層一層往上之下會浪費很多不必要的資源。所以那個時候才比較有系統地在做這方

面的工作，就是讓不同的單位之間增加他們的聯繫，讓大家知道說你有什麼，或是有哪些東西可以使用，所以這個是參與比較多的。其後李遠哲院長就任後，在推動各種改革也是很有心。他強調先從這個最基本的規章制度開始，慢慢一條一條建立起來。

李遠哲院長推了一陣子改革後，發現好像還是不容易做到。規章制度有了，但問題是只要大家都不理它的話，就沒有太大用處。所以李院長後來就跟我們傳達的意思就是說：「你們都討論、制定很多規章制度，但是誰來執行？你們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啊？！」所以他後來就建議說，你們這些參與的人都應該回臺灣來推動具體的改革工作，那時候我們也表示說，大家會盡快、盡量想辦法回臺灣貢獻我們的力量。其實當時最早返國的是王崧興[5]先生，王崧興 1989 還是 90 年就決定回來。不過當然王先生很不幸，他一回來就生病、過世了。

所以當時就形成了一些空檔，沒辦法在民族所這邊做一些具體推動工作。王先生過世之後，李亦園先生就一直給我壓力，說：「王先生不能來，那你要回來喔。」還算好，當時莊英章先生、徐正光先生他們先後負起重擔，可以順勢推動改革。

四、回臺灣主持民族所學術行政工作

黃樹民：

那真正決定回臺灣的話，大概是 2002 年。民族所做評鑑，評鑑的時候學術諮詢委員會要我做評鑑委員會召集人，那時候也找了很多國際學者來參與。評鑑完了之後，評鑑委員比如說像英國倫敦大學的 Stephan Feuchtwang 教授，中文名字叫王斯福，就提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我們這個評鑑委員會討論了很多民族所的問

5 王崧興（1935 年 11 月—1995 年 11 月），雲林林內人，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研究所畢業，1971 年獲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1965 年開始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任職，隔年也在臺大考古人類學系兼課，並於 1976 年擔任民族所文化組主任。王教授這時候開始以參與觀察的方法，在龜山島漢人漁村從事長期而深入的田野工作，為臺灣漢人家族與社會結構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典範。1977 年王教授應聘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1984 年受聘為日本中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教授，1992 年應聘至千葉大學任教，1993 年也在他的母校東京大學兼課。王教授長期思考漢文化與受漢文化影響的鄰近文化之間的關係，積極推動從漢民族的周緣來看漢文化，嘗試以這種宏觀的角度來整合漢文化與南島文化的人類學研究。

題，還有發展的方向，但是都沒有人做啊！你是召集人的話你應該先回來臺灣推動這些工作。」那我時候也跟他提到，後來也跟李院長報告過，我說當然這是個可以考慮的選項。我在美國那邊教書的話，也有我的行政責任，因為我是 2000 年才接 Iowa State University 人類學系主任。要我馬上把這個行政職務丟掉的話，對我那個學校也不太好。因為約都簽了，簽了幾年的約。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我就跟李院長講說：「讓我有機會跟美國那邊商量一下，討論一下怎麼樣的轉接能夠安排好之後我再回來。」那原來是預計 2003 年回來的，但正好碰到 SARS，SARS 的時候本來那時候的（中研院）副院長朱敬一說要到美國跟我談具體的事情，結果 SARS 一來，他也就不能來。所以就拖到 2005 年的時候，因為前面一年黃應貴故所長辭職，然後院方就跟我說：「那你非要來不可了！」我回應說我美國那邊還沒安排清楚，因為他們也要選新的系主任準備接手。所以談到 2005 年暑假的時候，美國那邊說他們找到新的系主任，那我才跟中研院的主管說：「我 2006 年 1 月 1 號可以來。」所以在這種狀況下才安排過來的。

正式到民族所工作，因為民族所這邊我很熟悉，且不只是民族所，因為以前民族所還包括社會學界，我跟他們也都很熟，所以在推動一些事情上困難度就比較少。而且有很多事情，我都是按照一些很基本的原則來做。第一、公開。然後要公平，不要搞小圈圈或私底下搞一些動作，所以能夠做到這樣的話，大家就會比較順利推動很多事，這個也是我那時候回到民族所最早的一些印象。一般來講，大概整個行政方面的推動，還有學術發展、跟外界的聯繫，基本上都還算蠻順利的。大部分的同仁也都很配合。其實我真正希望能達成的目標，就是讓大家做自己能夠做、想要做的研究。然後我們所方提供最好的條件、最好的機會讓大家能夠發展，這是行政主管最主要能做的事。換言之，就是能夠搭建不同的平台，讓不同興趣的人朝不同的方向發展。我想這個也是李亦園先生一直強調的——就是大家要朝不同的方向走，然後製造更多跨學科、跨學門，甚至跨國境的一些交流。我想我在民族所負責行政的九年，都是朝這個方向在做。

五、拓展民族所與臺灣人類學的國際學術空間

黃樹民：

不過九年中做得比較多的主要還是在國際聯繫上。我這九年之間參加了很多國際社團，然後也得到很多國際學者的重視。比如說像太平洋地區有一個叫「Association for Asi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就是亞洲社會科學論壇，這是一個三十幾個國家參與的組織，我們也主辦過他們 2015 年的年會。他們的執行秘書 John Beaton 教授也來過臺灣好幾次。可惜的是這位執行秘書已經過世，現在新的執行秘書也一樣，對我們非常重視，希望我們能夠多參與他們的活動、多提供意見。

另外當然就是由我推動成立的「東亞人類學會」(East Asi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我從 2008 年開始，聯繫了日本、韓國、香港、中國大陸跟臺灣的人類學團體聯合起來，每年開一次年會，在這五個國家或者地區輪流開會。本來也希望能有一些定期的出版，不過這一點在技術上是有一些困難，因為牽涉到龐大的經費問題，但是這樣的活動，每年一度的聯繫，都定期舉行到現在已經 15、16 年了，這對於促進亞洲東亞地區的人類學界的聯繫、合作都非常有幫助。

那還有就是國際人類學會 (WCAA, World Council of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s)。國際人類學會我也代表參加過他們很多次的年會，當然臺灣比較大的一個問題是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所以在很多地方上不容易說我們臺灣是一個國家，只能做為區域代表。這種限制，使我們無法參與他們學會裡面比如說執行長、會長、副會長選舉；這些我們都沒有辦法做，這一點的話大陸就有這個優勢，所以他們的中國人類學會的會長就會被選到這個國際人類學會當副會長，這個是沒有辦法，這個是現實問題，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克服。

當然這一點牽涉到一個問題，也就是說我們的學者，尤其在臺灣的學者，對於國際的參與是很保守的。當然是因為有很多語言的隔閡，或者是在一些交流活動。在這點我們跟中研院裡面其他自然科學或生命科學比，就有我們的缺點。我舉個例子好了，像有一個叫做「太平洋科學學會」，四年前他們才慶祝一百週年設立這個學會，整個太平洋地區大概有四、五十個國家參加。這是一個以科學為主的一個組織，但是對我們人類學者來講的話，不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啊！你要討論什麼，我們都可以跟

你討論嘛對不對？你要討論這個 Mangrove 紅樹林，我們也可以跟你討論啊！你要討論 Solar Panel 太陽能板，我們也可以討論！所以我們在這種場合，跟國際的科學界交流是沒有問題，所以他們太平洋科學協會四年前選我當他們的常務理事，而且是代表整個臺灣，這個對於自然科學或生命科學家來講，他們就很不高興啊：「我們怎麼找一個人類學者來代表我們科學界？」那我的反應就是說：「那對不起啊，又不是我自己去選，是他們要選我的，我能怎麼樣？」所以這一點， 我是希望臺灣的人類學者可以眼光擴大，然後很勇敢的走出去，不要怕！你只要研究做得好，拿得出東西來的話，人家絕對會重視的！因為在國際學術界的遊戲規則是很明顯的，其實這個跟一般科學研究都很像，就是說「你有什麼東西？你拿出來給我看。」你的問題是什麼、你的研究過程是什麼、你的結論是什麼，整個流程清清楚楚的話就沒問題！比較怕的是拿不出來的時候，那就沒有辦法了，人家不會重視你！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問題。

六、期待更具開放視野的民族所

黃樹民：

所以民族學或者民族所，當然現在看起來的趨向還是蠻開放的，就是說要走出去、要慢慢更擴大你的視野，然後慢慢能夠跟不同的學門、學科，跟他們合作、進行交流，然後把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拿到國際學界去呈現，去跟人家討論，這個是最基本的。

我們老一輩的學者像凌純聲先生、劉斌雄先生都是我們的好榜樣。劉先生那時候做數學人類學的研究，一開始我真的看得一頭霧水，看不懂他到底要做什麼？到後來慢慢多接觸了之後，就慢慢了解說，他在運用一些數學上的新觀念，像 Group theory 這種，來擴大親屬研究；它怎麼樣能夠從親屬稱謂上找到不同的組合方式，這樣的話，就慢慢可以理解說，他要試圖做的（研究）是往哪些方向去？這些其實都是一些很好的取向。

我想最主要的就是想表達，我們民族所的同仁其實應該抓住人類學有幾個最基礎的東西——一個是深度民族誌，你要真正深入一個文化，去了解當地的人怎麼思考、

怎麼生活、怎麼安排他們的需求，他們的價值觀是什麼？有這種深度的民族誌的話，就可以建立起一套所謂「異文化的理論」出來，而這個是我們目前非常缺乏的。

所以我現在一直在看一個問題，就是說，日本民族學者、人文學者在臺灣的時間其實不長，只有不到五十年的時間。但是他們為什麼能夠留下這麼多豐富多彩的材料？那我們到現在也七十年了，好像跟他們還是有點距離。要問我們在什麼地方有超過他們？現在還是看不到！所以這是個很特別的問題，就是說我們可以在哪些地方超越以前人的成就和貢獻？能夠提出我們這一代人的貢獻在哪裡？這是一個民族所可能要用什麼方式來應對的重要問題，譬如說辦一個 retreat，大家可以坐下來，思考問題。當然這有個前提就是說，大家有不同想法、不同研究取向的人，能夠用比較開闊的心胸來了解別人，來跟別人接觸，不能畫地自限，那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大問題。

當然我一直覺得，人類學界或者民族學界都好像缺少一種能夠勇敢地去突破自己框架的勇氣和決心。每個人都有一個框框，不管是你從小受的教育、你的文化價值、專業訓練等。這個框框都在那邊，你能不能夠跳出來，走出你的框框，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問題。就是說有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好的、大家可以討論對話的一個場合；而不是互相攻擊、互相排擠，這一點能夠做到的話，就比較容易有好的一些開展。

所以我想到我 196 幾年到民族所的時候，那時候碰到劉枝萬[6]先生、鮑克蘭、曹永和等人，你隨時都可以跟他們談啊！他們興趣也都很廣，有什麼問題問他們，然後他們就會很有耐心的慢慢地跟你討論。這一點心胸開闊的態度跟價值觀有沒有辦法慢慢再培養出來？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我們的前輩，像李亦園先生、王崧興先生，他們也都嘗試在朝這方面做。不過好像到了後來就發現越來越不容易做到；就是這種既有的門戶之見，就是大家都要畫自己的界線、畫自己的小圈圈，然後就用這種批評的方式，不接納、不考慮別人的想法跟意見，這也就會變成要推展這種合作，就會變得非常的困難。

---

6 劉枝萬（1923 年 12 月—2018 年 1 月），南投埔里人，臺灣著名的民俗學學者。1965 年，加入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隨後投入中國民俗研究，並陸續發表《臺灣民間信仰論集》和《中國民間信仰論集》等論述作品。1977 年以《中國道教の祭りと信仰》獲得東京教育大學文學博士學位。

我就想到，記得有一次是在中研院的生物多樣性中心，那時候是李文雄[7]院士他是做 DNA 的，他給一個在中研院的公開演講，就想從 DNA 的研究來了解人類的起源跟分支，中間到底是怎麼發展的？然後我就想：這個題目應該人類學家都很有興趣啊！結果到他那邊坐下來一看，我們所一個人都沒有，我是唯一的一個。我就覺得很奇怪，一個人類學家，既然有一個主題要談人類的起源和發展，這樣的演講居然一個人類學者都沒有，那這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了！假使每個人都只能抱著一小塊、一個小圈圈、一個筆筒，還是管它叫什麼百寶箱，抱在手上就不放，然後外面的東西都不去看的時候，那就很麻煩了！你要學術進展的話，就幾乎不太可能了，所以我想這是一個比較會令人擔憂的問題。

當然專門化是必要的，就每個學科的發展是會越來越專門、越來越走向越小的題目，然後用更精深的方式去探索——但是這個並不排斥說你要走出來，看看外面是什麼。所以這種自我設限就變成一個要怎麼解決的困境，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可能並不容易，但是要培養出一種氣氛，讓大家會主動的說：探索未知應該是我們主要的一個取向、主要發展的方向，這個大概是我的一些基本的看法。當然就是說我們有些同仁的著作有這些，可能還沒有完全發表、對外公開的，這我們還不知道，希望是有很多能夠有突破性的、有前瞻性的、有開拓性的一些東西拿出來，這樣的話我們才可以期望說民族所下一個七十年要走到哪裡去。

葉光輝：

院士講的其實我心有戚戚焉。因為我本身是學心理學，然後就到民族所來服務、工作了，我接觸到的都是跟我原來心理學不一樣的人，我原來都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在思考問題，後來我到民族所，社會學的、人類學的（同仁）他們常常問的問題都會讓我覺得「怎麼會問這樣一個問題？」（黃樹民：對，沒錯！）我非常認同院士剛剛所講的，就是說事實上知識的發展，本來就是透過不斷的交流與發散，來加深它的強度

---

7 李文雄（1942 年 9 月—），臺灣演化生物學家，屏東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曾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特聘研究員，回臺灣服務之前，是芝加哥大學生態與演化系的 James Watson 講座教授。研究興趣為群體遺傳學、生物資訊學、分子演化和基因體演化。

跟深度。而且如果沒有拓展出去，事實上你也沒辦法把你的這個深度的東西可以應用到其他的學科上面，或是到一般的人類社會裡面。

我們回到剛剛院士所講的，就是您早期參與全院的，因為那時候您提到院長邀請您回來，做整個全院的一些審查制度、評鑑制度的規劃發展，這樣的一個設計；然後慢慢到就是說有制度但沒有人執行，（那陣子）也剛好就是您在 Iowa State University 最忙的時候，擔任系主任還特別把您請回來，那您在民族所這將近十年的時間當行政主管，也做了很多，我們覺得民族所就是真的像您剛剛所講的朝向國際化、走出去。

我的印象就是院士來當我們所長之後，就有很多的國際交流，事實上在我自己的經驗，因為我是學心理學，師承楊國樞院士，他也都告訴我們就是要走出去——雖然他在強調（心理學研究）本土化，但他談的本土化還是要朝向國際化的。（黃樹民：要讓國際人士知道你做什麼）沒錯，人家還是要知道您在做什麼，他那時候就經常帶我們出國參加會議，我比較少看到人類學像楊院士帶我們出國開會的那種經歷。楊先生是會經常邀請國際學者來訪，或我們一定要跟他去國外參加學術會議，然後要主辦國際會議。像他成立的華人心理學家的全球會議，然後主辦亞洲社會心理學的會議，還有主辦 ICP（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Psychology）就是國際心理學會議。事實上他都是積極地參與整個國際的學術事務，所以我覺得跟黃院士剛剛所提，是完全相符合的。

那剛剛黃院士提到一些，就是說「為什麼走不出去？」或者是有一些困境，當然有一些客觀現實的，比如說我們整個不在聯合國裡面這樣的一些地位等等之類的，可是還是可以有作為，就是像我想到的，因為楊院士也辦了好幾個國際的會議組織，然後他就會鼓勵我們，就是說每幾年就要再把這樣的國際會議重新整合起來，像我們的「華人心理學家國際學術會議」，每兩年辦一次，從 1995 年開辦（第一屆）到現在已經到了第十三屆了，我們等於算是有將近二十九年，快三十年的時間在推廣。那參與的亞洲社會心理學會也是一樣。所以覺得現在就是談，如果以民族所這麼好的資源、這麼好的人才，那從黃院士的角度，如果要提一些比較具體的建議說我們要走出國際化，可以有哪些比較具體的一些建議？這當然是提供建議，那後面我們可能還要再加把勁啊！

七、期許民族所同仁多申請院各式主題計劃

黃樹民：

對，其實院方有很多政策也都是在鼓勵各個學術單位能夠盡量地開展。一個是整合內部的力量往上發展；另外一個是走出你自己的單位，跟其他相關的單位合作。往上發展比如說中研院有很多計劃、院主題計劃，像深耕計劃，還有前瞻計劃，各種計劃。我當所長的九年就不斷提計劃，試圖把一些同仁整合起來，然後去做一些能夠大家一起合作的研究。比如我一回來的時候，那時候是李院長，就要我負責這個「臺灣原住民政策評估」的計劃。那個計劃也做了兩、三年吧。當然不只民族所的學者，民族所的學者當時像劉璧榛，還有周惠民，還包括別的單位、別的學校的學者共同參與。

那後來院的主題計劃，我也是大概每兩、三年都會提一個主題計劃，都是試圖整合除了我們所裡一部分學者之外，也希望能夠擴大到整個外面的學者來共同參與，包括後來永續科學中心也提這種長期主題計劃，我都提過。當然現在自己要提這種計劃，比較大的困難是有很多小圈圈——那小圈圈的話，他們都把自己先劃定了說他們做的是什麼，然後你提一個比較大的東西、一個大的方向，說請大家來整合、一起做的時候，他們就會排斥。

我在所裡提了幾個計劃，也都基本上公開邀請所有的同仁參加。但是很明顯就有很多小團體不願意參加的，就是他們一開始就排斥：「你們跟我們不同路，所以我不會參加你的東西。」這個就沒有辦法了。大家都劃一道自己建的城牆，然後有壕溝，不願意跟外面的人接觸，這就一點辦法都沒有。

所以像跟我合作最多的就包括像臺大地理系的蔡博文[8]教授，他用 GIS 來幫我們

---

8 蔡博文（1956 年 12 月—2024 年 6 月），1975 年就讀臺大地理學系，後赴美深造於 1987 年獲馬里蘭州立大學地理學碩士學位。回國後，積極推動臺大地理學系 GIS 的研究與發展，成為臺灣將 GIS 技術與國土資訊系統結合的重要推手。同時也在臺大地理學系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於 1994 年取得博士學位。自 2001 年起，蔡教授運用公眾參與地理資訊系統（Public Participatio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PPGIS）進行原住民傳統領域調查。這項研究不僅結合地理資訊科學與社會科學，也深入探究了 7,000 餘個傳統地名，3,000 餘個地名故事或傳說，以及超過 300 個傳統領域範圍。他在多個原住民部落進行了深入研究，

計劃的研究人員怎麼樣找到一個新的途徑來了解原住民的基本資料，像這種的話是大家可以互相得利的——我們請他參加我們計劃，他提出他的專長來幫我們，我們也把我們的觀點跟他講，所以他後來也在臺灣人類學刊登了文章，完全用一種新的觀點來看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希望能夠做到的。

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就是說因為有這種小圈圈的存在，就會有很多一開始就排除掉任何合作的機會。譬如我後來做臺灣原住民的適應問題，很多做臺灣原住民的學者就不參加，這個你也沒辦法，你也不能說你非要來參加不可，這不是我們能夠做到的。所以在這種狀況下的話，當然要打破這種界線，要怎麼做？這個我還沒有辦法想到這點。

八、臺美學術相關事務運作的差異

黃樹民：

這點的話跟在美國學術界不一樣。美國學術界像我跟我們同事有不同意見，我們可以拍桌子、吵架都沒問題。但是吵完架之後一起去喝啤酒，可以繼續聊嘛，並不妨礙說我們是同事又是朋友——你有不同意見很正常嘛，但是你要能夠互相尊重就沒有問題。這一點的話跟亞洲社會不太一樣（葉光輝：民族性的問題？）我想有（民族性的原因），在某方面是整個社會文化的結構是不一樣的。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好了，就是說當然我們制定很多規章、制度，都是希望大家能夠遵守，因為所有的行政管理，最好的方法是制度去管人，不是人去管人——人管人的話，這個就沒完沒了的。但是我後來當所長這幾年就發現要做到這點很難，規章

探討了賦權、參與、領域觀和空間認知等主題，並結合多媒體 GIS 技術，系統化地組織和保存了所收集的傳統知識。此外，他將 PPGIS 的研究延伸至其社區林業和社區監測研究，是國內 PPGIS 研究的先驅，並將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調查的經驗推廣到社區監測和社區林業等領域，成為國內將 GIS 與公眾參與人文社會議題結合的傑出地理學者。蔡教授同時參與中研院內多項大型跨學科整合型主題研究計劃，例如：藏彝走廊的生態環境、族群文化與未來發展、陳有蘭溪流域的人文社會經濟發展與自然環境變遷、人類世的永續發展：臺灣都會生活的變遷、石碇光明社區社區建置計劃，在原住民族在地知識、環境資源管理、社區參與、空間整合社會科學研究議題上都貢獻其廣闊且獨特的地理學視野。

制度是一回事，但很多同仁就會跑來：「欸這（規章）訂給別人的吧！我應該是例外吧？」當每個人都例外的時候，你事情就很難做。那不只是這樣，還有比如說以前的一些學生就會跑來跟我吵說：「老師你為什麼不照顧我們？」我說你不符合規定的時候，你就不符合規定，對不對？那為什麼會需要特別照顧呢？這個是沒有辦法的，我們東亞社會當然不只是臺灣，大陸也一樣，日本也一樣，韓國、香港都一樣。香港可能好一點就是，當然共產黨去了之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完全是一種人治的觀念，所以在亞洲社會的話，就是說一個大家長的權力是最大的，然後底下做事情就很難做，就比較沒有那種遵守大家共同能夠接受的一套法制的管理，這個不太容易。

我舉個例子好了，我在美國當五年系主任，解聘了兩個助理教授、一個副教授。解聘就解聘啊，你不符合要求。我一開始就把我的標準告訴你，我期待你每年做什麼？然後你要升等你要給我什麼？你拿不出來的話就走路，這很簡單嘛。當然也曾經有一個我請他走路的時候，他跑來講到：「你這樣的話對我很不利。」因為他有慢性病。我說我這樣做也是沒辦法的，我們學校不是一個養老機構啊！你要解決你的問題，你的病是你的問題，你要先解決。你不符合我們這個契約上的要求的話，你只能走路，所以到最後沒有問題自動離職。

但在這裡就很難了，就是我以前學生跑來跟我吵說：「你怎麼可以對我這樣子？我是你學生啊！」我說：「你是不是我學生不相干，你現在是雇員嘛！對不對？你在我們契約上簽的約，要你做什麼事你做不到的話，我沒辦法。」像這種的話是完全不同的一套運作機制，就是說不同的社會、不同的文化，它整個運作思路其實不一樣。所以變成說我們現在的這種學術審查制度、學術標準、要求，老實講都是從外面來的，那這個制度水土不服，你也沒辦法。我們硬要把這套東西弄下來的話，就會碰到很多困難，但是你不這樣做，會不會有別的問題？可能問題更大！所以就變成幾乎可以說是無解的困境。

就是說在我們的社會裡大家強調的還是所謂「情理法」，「情」還是擺在最優先，還是講人際關係。所以這個也是大概臺灣學術，尤其就是人文社會科學比較大的問題了——把第一優先放在人際關係上，就是一到一個機構，無論學術機構、研究機構，都是先去經營人際關係，而不是好好做你的研究，這個就沒有辦法，這個幾乎是很難很難解決的問題。

葉光輝：

因為院士提到華人社會的情理法，情放在前面，法放在最後面，所以很多事情在執行上面就會大打折扣等等之類。我知道院士研究過，比如像您在 1967 年到廈門研究林村，那從林村那邊的一些經驗裡面，他們也因為社會變遷、社會改革，不斷地（改變），可是他們還是有他們的發展、他們還是有他們的變化，那即便是「情理法」，但其實他們好像還是有一套運作方式，使得他們在這裡面還是有他的利基存在。

黃樹民：

對，沒錯，當然還是說極權政權它有它的長處。這個長處，第一就是說一個命令從上面貫穿到底下是比較快的，而且比較容易做到。舉個例子好了，就是說像 Covid 19 新冠肺炎的時候，北京要建方艙醫院一下子就可以建幾十個、上百個出來，都沒問題。極權統治利用這個強制的暴力去控制是絕對有效，效率是絕對有的，但是在這個過程裡面，很多東西就沒有掉了——一個是人的尊嚴沒有了，就是對人性的抹殺。共產黨是能做到效率世界第一的，這沒有辦法。你只要看 1957 年的費孝通，那時候是反右，開始是大陸就推行「百花齊放」，毛澤東要大家講話然後費孝通就開始講話，就寫了一些文章說「為什麼我們碰到困難？」然後過一陣子之後，毛澤東就跳起來說：「好！我就是故意要你講話，我才知道誰是反黨份子！」然後費孝通趕忙寫一篇文章叫做〈向人民伏罪〉。這個事件是荒唐的！就是說一個知識份子會逼得自己要寫一篇文章來罵自己，然後說：「我全部錯了，我不是人！」什麼話都罵得出來，這個只有中國共產黨做得到。所以他們這一點成功的地方，在今天就看得很清楚——今天我們跟大陸學者只要接觸，哪個不在罵？罵說：「他這個腦袋有問題了」，他們都在罵，但只敢私底下罵，不敢公開的講，稍微公開一點的言論，尤其在文字上完全不敢發表。這個是沒有辦法的，就是這種制度，它是很有效，可以管得住這些人，但是這些人是什麼呢？沒有個人尊嚴的人還是人嗎？所以這就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在林村的話，基本上從他們的公社制度、整個發展過程來看，從原來的這些農民都很窮的、原來都是光腳的、冬天沒有鞋子穿走到水稻田裡去種田的，到現在都是開了進口車的。連十幾歲的小孩子都開進口車，發展得非常快，沒有問題。但是在

這個過程裡面，他們也學了很多東西，因為公社化時期從 1968-1978 的十年之間，人民公社把他們搞得多慘，每個人都學會怎麼樣投機取巧、每個人都學會到怎麼樣能夠假裝做事——但實際上是不做、實際上是在磨涼工。他們講最有意思的一句，是那邊農民的口頭禪，「三坨韭菜根，勝過算公分」。就是你家裡頭種了三坨韭菜，你割了韭菜拿去賣，就勝過你在公社裡面拿公分。因為在公社裡工作一天，成人男子只給十個公分，婦女是六個到七個公分，到年底才說一個公分是多少錢。換言之你去公社做事、替國家做事是沒有意義的，還不如自己在家裡種韭菜。因為這是一個完全失敗的制度，所以為什麼人民公社垮地這麼快，就是因為這完全違反人性的，就是一個虛幻的一種烏托邦主義；「大家平等、大家都能分享一樣的東西」，其實根本不可能嘛！所以大家就造假，就變成一個完全虛假的社會，所以這個社會裡，說真的我是看不到任何希望。大家都在作假，從上到下，尤其他們學術界更糟糕。先是自己畫線，這個不能碰、主席的話不能碰、政策不能碰、黨的意志不能碰，那你能碰什麼？完全沒有批判的精神、完全不能夠突破的，這個社會是死掉的。

葉光輝：

所以一旦有問題的話會讓那個問題越來越累積、越來越大。

黃樹民：

對，完全是用暴力把它壓住，這我覺得這是一個大概要等著崩潰的社會，沒有辦法維持下去。

九、當選中研院院士及總統科學獎得獎者的感想

葉光輝：

接下來想請教院士的，就是您在 2010 年當選院士，然後在 2015 年當選總統科學獎。這兩次都是學術界最高的榮譽，也許請院士跟我們談一談，說說您當選院士與獲得總統科學獎，整個您的感想、感言，或者是您覺得有一些值得從您這樣的得獎經驗裡面可以告訴我們後輩、年輕學者的。

圖 2　2010 年當選第 28 屆院士（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黃樹民：

我想大概這就有幾方面的考量，就是說就像我們要參與選舉院士的話，就會考量到說要用的標準是什麼？在有些學門來講的話，比如說一個歷史學者，他寫了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花了一輩子的時間終於出版了，然後這本著作整個改變了一個世代的趨向。那像這種的話，可能人家就很容易說，這個是一個很可以尊重的一些榮譽，然後給他一個院士，但有些並不一定是這樣。另外有一些可能是比較長遠的，而且是除了看你的學術貢獻之外——就是單純的知識累積，一些觀點的突破之外——還有其他的影響是什麼？換句話說，就是在做各種評鑑的時候，因為我自己是被選為院士，然後也被這個總統科學獎選去得獎，現在我來看這些問題的時候，也發現說這確實是很難找到一個平衡點、一些標準。就是我們在要決定一個人的學術成就的時候，你要看他的成就是什麼？他是在某個方面有突破呢？或者有新的觀點，然後導致整個學術突然大步地前進了？或者是說這個人在做基本功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一點一點的累積，在學術累積方面有很了不起的成就。雖然我們看不到一個很大的突破，但是他從一個問題轉到第二個問題、第三個問題。比如說《二十四史》他每一部都寫，那這是不是他的貢獻？這就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成就，但這確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現象。

因為我最近也參與很多這方面的這種評鑑，就會發現說：我們要看一個學者的貢獻的時候，到底是看他的什麼——他的學術累積呢？還是看他的某一個特殊點的突破？那這中間其實差別就可以很大。

我 2010 年，那時候院士的選拔，可能比較是我比較長時間的累積，因為從早年的一些著作，包括了不只是我在臺灣的研究，還有在中國大陸，甚至到東南亞這些整個的研究方向，可能他們在評鑑的時候就認為說，這個在學術累積上，可能是有很長遠的貢獻，那就可以作為一個典範，然後就選為院士。

那至於總統科學獎的話，好像就不太一樣，因為總統科學獎一般來講，它是給做「科學研究」的，那到目前為止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我所知道的是，只有三個人拿過，一個是朱敬一院士，一個是李壬癸院士，我第三個。那當初朱敬一院士是經濟學家，經濟學家的話他們的貢獻是很明顯；那李壬癸院士是語言學家，他的貢獻也很明顯；那等到我在看我自己的時候，我說：「他們給我的這個榮譽，他用的標準是什麼？」可能不是像朱敬一院士對於國際經融貿易觀點的突破，或是李壬癸院士在南島語言研究的突破。因為我在學術研究上倒沒有像他們那樣有一個很明顯的、某些方面的一個突破點，或者一個新的理論提出來。那可能他們看的就是長時間的累積，然後在學術貢獻之外，還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力，像這種比較長期的考慮而給的獎項。

所以這就顯出一個很有意思的差別，就是這個平衡點在哪裡？這一點的話，當然因為我們現在也都會參與新院士的選拔，還有其他一些重要獎項，像科技部，現在叫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之類，你就會看到這中間是會有很多不同的取向，那這些取向到最後的決定確實都是很困難的。尤其在委員會的委員在投票的時候都會非常掙扎，就是到底我們要怎麼看這一位學者他的貢獻在哪裡？然後要給予怎麼樣的評價？我想大概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說——尤其是我們在中研院這種，以做學術研究為主，然後以學術累積或學術生產為主要目標的話，我想怎麼樣好好做研究是最根本的條件。就是你能不能夠很腳踏實地、非常安心的、不要胡思亂想，好好做一件開創性研究。不管你是做什麼題目，好好研究下去，然後你有結果的時候，怎麼樣能夠把它清楚地表達出來，讓大家知道你在做什麼、你的貢獻在哪裡。這一點能夠做到的話，大概就比較容易被人家看到，我想這個大概也是我們同仁應該去做的方向。因為畢竟說真的，我們在中央研究院裡工作，其實都是納稅人出錢養的！納稅人花這麼多錢養我們，他們的

目標到底是什麼？他們希望能夠得到什麼？那我們能不能做到這個事？這是每個研究者都應該考慮的問題。就是說我們會不會做到最後不會對不起納稅人的錢？這個還是最根本的問題。

因為在一些場合裡，很多同仁也會問到這個問題，就是到底我們要怎麼樣才能夠真正的出頭？那真的就是說你能不能拿出東西來！假使你都沒有好好做一個花時間、花精力的研究，那你怎麼能夠期待別人會認為你是很重要的？我想這是大家應該都要考慮到的問題。

十、對年輕學者從事研究及民族所未來的期許

葉光輝：

院士很語重心長地提出對於年輕學者的一些建議，我也相當認同，就是說因為每個人的研究主題不太一樣，然後研究的一些焦點，不管是深度、廣度還是不太一樣，所以您只要把它持之以恆、很認真、很用心地去做就對了。我也常跟我的學生講說「熟能生巧」，如果您在某個東西做久了、持久以後，您自然而然就會有一些巧妙的東西，那能不能突破，或者是能不能清楚地表達，那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至少您持久地去做某件事情，能夠把那件事情了然於心，然後很透徹地，自然而然它就會有一些巧妙的關鍵點出來了！所以這些還是相當值得年輕的學子參考的。

另外在前一節的時候我也注意到，好像您帶領了很多的，不管是主題計劃、前瞻計劃、永續計劃，我比較注意到的就是您跟其他所長不太一樣的地方，其他所長他們也是很認真在處理所務，但是他們好像都沒有把全所的整個人，或者是跨所去找一些人做出一些比較有長遠性的或持續性的研究計劃。所以是不是也希望像院士剛剛提到，retreat 的時候，我們事實上有很多的研究群，然後我們這些研究群好像應該可以去朝那種主題計劃、前瞻計劃、整合計劃的這個方向去思考及發展？

黃樹民：

我想這點可能是因為我的條件跟別的所長不太一樣。因為我長年不在臺灣，所以並不屬於任何一個小圈圈，所以比較沒有這種包袱！就像我那時候推一個計劃的話，

都會先做一些公告性的，讓大家知道說我現在有什麼想法，希望能夠推一個計劃，然後我會比如說每個月或每兩週禮拜幾下午幾點在比如說第三會議室找大家來談談，願意來的都歡迎。像這種的話，基本上是公開的，然後我歡迎任何人，不管你是屬於哪個圈圈，你只要願意來，坐下來談談，我們然後都可以想出來說，找到一個大家都有興趣的一些共同點，然後共同來做研究。

當然我也會想到，在我前任、前面的，或者後面的這些所長，可能就會碰到一些困難，因為他們可能會跟某些圈圈比較接近，或者比較疏遠，所以呢就會比較不容易打破這種界線。那我的優勢，第一個是我的年紀，因為你想想看余光弘、林美容都叫我老師的，所以這個就先天優勢就沒辦法，就比較不會受到這個年紀這種的困擾，或者是說別的同仁會說：「啊因為你年長，所以我們會要對你客氣一點！」這是完全有可能的！還有就是說沒有這個小圈圈的包袱，因為我沒有班底，我沒有一群因為我來這裡了，我就把我的那些以前的學生余光弘、林美容全部拉起來到後面說我們要怎樣怎樣做。做事就沒有這種包袱，事情就比較好做。當然這個中間也會碰到一些困難，就是說你碰到那些很明顯他抵制你這一群，那沒辦法，那我就到外面去找找別的機構，或者別的所的同仁來參加，這個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那時候可以找生醫所鄭泰安研究員來參加計劃，這個都不成問題，因為只要能夠保持一點開放的心胸，事情會覺得比較好做。我們其他的同仁，也就是其他幾位所長之所以會碰到困難，會不會是因為他沒有像我的優勢：年紀大，然後沒有包袱，所以這個差別可能是這樣。他們在執行上就可能會很困難，變得不容易找到一個要推動的東西。所以這個還是跟我們整個社會文化有關，就是這樣的一個制度底下，大家都很習慣一種行為模式，然後用這種行為模式去做事的時候，就會有很多限制出現。我想這個是沒有辦法，所以院裡的主管也跟我談過這個問題，說：「為什麼你卸任之後，你們所裡都沒有主題計劃出來了？」[9] 我說這個我也沒有辦法，這個是條件不太一樣，因為不同的個人其角度不一樣。

9 黃院士卸任之後的短時間內，民族所確實沒有人申請主題計劃，但後來有同仁申請通過計劃並執行。

十一、對於國內推廣博雅教育的看法

葉光輝：

剛剛院士所談的，讓我想到一個事情可能跟剛剛所談的這些有點關聯，就是說應該差不多二十年前臺灣開始在推博雅教育，事實上博雅教育就是希望說不要太專精、太畫地自限等等之類的。可是您覺得臺灣推博雅教育到現在，它有成功嗎？或者是它有沒有什麼樣的困境？以您在高教服務這麼長時間，您看到的一個情形，您覺得臺灣在推博雅教育的優、缺點，目前看到的情形是怎麼樣？

黃樹民：

我想到大致上來講，各個大學都很努力在做，比如說他們提出來的一些可能性，像通識教育。通識教育的目的，也是說能夠盡量把學科的範圍擴大，讓不同領域的人可以到領域之外去選修一些課。當然臺灣在做這方面的時候是形式上做得很多，就是說各大學都有通識教育中心，然後現在很多大學也推動，比如說各學院的學士班就不分科。大概比較大的問題，就是在於整個制度運作上的問題。我們以工學院做例子來講好了，因為工學院他們每一個學生從進去到畢業，需要修滿固定的學分。現在臺灣大部份是 128 個學分，對他們來講是不夠，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你要整個從工學院，不管你進入哪一個科系，然後等到你要畢業的時候，你要學到基本的知識，然後能夠達到基本要求的話，四年時間都很困難，所以在這種狀況下，他們基本上是會排斥掉到其他學院或其他學科修課的機會。

所以工學院他們當然也有基本的要求，比如說會修像大一國文、大一英文，但是已經是削到最低點了，所以變成說通識教育到最後，真正能夠提供給人文社會學科之外的學門來修的機會其實不多，因為他們大部分都有這種要先保住自己學科的要求；比如生命科學院，他們也希望盡量把他們自己的學生留在修他們生命科學本科生的項目、學門裡。

這點在國外就很不一樣，像我在美國教書的話，我教人類學導論課的時候，在大禮堂上課，底下 400 多個學生，大部分不是人類學的，幾乎人類學主科的很少，然後大部分也不是人文社會科學，反而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系的。因為他們是被逼著非要修

基本的通識學分，比如說 9 個學分的人文社會學科你非得修，9 個學分的語文你非要修，所以他們可以強迫學生去接受到這種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而不是把專門的知識當成最重要的要求。我們是把專門的知識當成最重要的要求，尤其是理工方面，他們太多必修課，這樣的話就完全把學生的潛力、創造力全部束縛到很小的框框底下。這點是麻煩的問題，但是你很難改變，因為臺灣的整個教育制度，除了學校或者院系在制訂一些規範之外，教育部還是很重要的，那你要得到教育部許可要改變的話，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在這種狀況下，就變成一個惡性循環，大家都知道問題在哪裡，也知道說重點應該不是放在「專精」的學習，而是放在打大打寬你的視野，但是實際上很難做到，所以這個是臺灣教育界制度上一個比較大的問題，但是不容易改變。

十二、AI潮流發展趨勢下人類學的利基

葉光輝：

最後因為時間的關係，我想請教院士一個問題，就是院士應該也注意到，這應該是很明顯的，就是未來十年 AI 它可能帶來一些衝擊；這個衝擊不管對任何一個學科，尤其對於人類學，對於我們民族所都會帶來一些衝擊。我相信院士應該想過這個問題，所以在這樣的 AI 潮流的衝擊底下，院士對我們怎麼因應這個 AI 的潮流衝擊，您有什麼樣的具體建議提供給我們參考？就是說我們必須要及早做一些思考跟準備，而不是等著它們把我們打垮？

黃樹民：

我想最基本上就是說，一個需要適應的問題就是對於網路科技的發展。當然人類學比一些學門有優勢，你說像文史這種學界的話，他們的基本材料現在大部分都是數位化了，然後不管你要做什麼東西，你要查數據、用大數據方式去解決問題就比較容易。那人類學家的優勢在哪裡呢？就是其實很多我們的原始資料是我們自己創作出來的、並不是在資料庫裡找得到的，這個就是我們的優勢；換句話說，我們怎麼樣能夠把我們在一些現有的資料庫裡面沒有辦法掌握的，或者還不存在的東西，我們怎麼樣能夠用它來做我們的基本材料？就是搭配你現在資料庫的東西怎麼樣找出一些更新

的觀點、更新的一些做法？這個是我們（人類學）比較容易做到的，但是這方面是需要花時間去研究。就是我們怎麼樣能夠把一些 AI 所處理不到的資料，帶到學術的一些分析裡面去，甚至把一些以前沒有看到的東西把它打開。這方面來講的話，要怎麼做？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那當然我們人類學界好像也開始注意到這樣的問題了。像我們清華人類所今年新聘一位教授就指明了說他做 digital sciences，這個的話當然是希望說能夠影響到下一代的學生，讓他們有機會接觸到這方面的科技跟知識，然後怎麼樣結合人類學的長處——尤其是民族誌，說真的很多民族誌的東西現在在資料庫裡是沒有的，要是能把我們的長處在這方面表現出來的話，確實就是可以有些比較突破性的看法。

至於實際要如何做的話，可能就需要下一任的民族所所長能夠提出一個前瞻性的計劃，去院裡尋找合作伙伴，整合不只是人類學、民族學方面的學者，還包括了一些所謂數位科技的學者參與，怎麼樣結合起來，看看怎麼樣能夠找到一些新的突破點，我想這個是應該可以做的，看看怎麼樣能夠找到一些新的突破點。這個應該是可以做到的，但就還是需要能夠怎麼樣突破現有的一些限制，這是我希望民族所能夠利用這個機會，趕快一步跳躍起來，發揮出早年這種充滿活力的這種研究氣質。

圖 3　黃院士榮退活動（民族所博物館提供）

葉光輝：

從剛剛院士談的內容裡面我 catch 到一點，抓到一點就是說 AI 的衝擊相對於其他的學科來講，人類學應該比較不須擔心的，因為人類學有豐富的民族誌。而且這些民族誌事實上它都是一些新的資料、創新的資料，事實上它可以提供給數位科學很有用的一些新的知識，所以只要善用民族誌這些細膩材料、資料等等之類，事實上人類學可以在 AI 的浪潮裡面有一些迎頭趕上，甚至可以帶領做某些很有前瞻性的研究議題。

黃樹民：

因為我們會看到一些一般學術學者沒有看到的東西，因為你不管做民族學、人類學，大部分都會有這種跨文化的視野。具有這種視野比較容易看到說大家都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習以為常、認為很普通的東西，但實際上它後面的深層意義在哪裡？其實人類學者應該在這方面可以看到很多東西，然後提出他們的看法，那這種看法呢，並不是 AI 可以提供的，我想這個是我們應該很有自信的一個地方。

葉光輝：

那最後的話，看看院士還有什麼您覺得您想要提供給民族所，不管是現任的研究人員，或者是將來的人類學的年輕世代，您還有些什麼想要跟我們分享的？

黃樹民：

當然最希望的還是希望大家能夠專注做一些有長遠意義的研究，盡量避免說今天流行哪一個名詞，我們就跳進去，然後就覺得說「欸我們也要做這個」。這個我想到最後的意義不會很大，就是說能夠腳踏實地好好做研究、能夠專心深層地去挖掘一些問題，然後去找尋答案，還有就是好好地把它寫出來。因為人類學學者或者民族學者好像在寫作方面比較慢，就好像常常會有這個不容易生產論文的問題。當然要怎麼克服又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怎麼樣能夠改善大家寫作的能量、方法，然後在著作上能夠走向國際，不要只是在小圈圈裡面轉來轉去。要能夠不只是在臺灣的整個學術界發表，而且還能到國際學術論壇發表。這樣的話，就可以有更大的影響力，這一點是我們需要再繼續鼓勵大家朝這個方向做的重點。

十三、對於人類學年輕學者寫作出版慢的困惑與期許

葉光輝：我想因為時間的關係，還是佔用一點院士的時間。剛剛院士提到，就是說人類學者在寫作上會是比較慢的，但是人類學者應該文筆都相當不錯，寫作應該不是問題。（黃樹民：對，理論上是這樣對啊。）因為他們不管語文能力或者是其他知識方面的能力應該都不是問題，那寫作慢的可能原因是什麼呢？

黃樹民：

這點也是我一直沒辦法理解的，像我認得很多年輕一代的學者都是卡在這個關頭，都是有想法、有資料，也有理論。但是你要他寫出一篇文章，甚至寫一本書，那就都搖頭，寫不出來，很多到了退休時都還是交不出來的。

這個不只是臺灣，我在別的地方碰到很多年輕人都有這個問題（葉光輝：是邏輯組織能力的問題嗎？）不曉得呢？因為平常的話都談得頭頭是道、邏輯很清楚、表達也很清楚，也都沒問題啊，但是到了最後就交不出來作品。

比如說我們主持一些討論會，請他們來做報告，都沒問題。但是報告完了之後，說：「你能不能把稿子給我？」我們想辦法把它整理，編一本專書就是交不出來。這個就是我一直沒辦法理解，這點好像在人類學界、民族學特別明顯。就很多到了最後升不了等，就是交不出東西來，就是我們有多少位是升不了等的，到最後還是副教授、副研究員退休的，這個怎麼解釋是我沒辦法解釋的。因為我認得這些都應該是不錯的學者。

葉光輝：

非常感謝黃院士今天接受我的專訪，提供非常多很有深度的寶貴建議，都值得我們現任同仁好好思考的一些內容，我會把它謄錄出來，做為民族所所史的參考資料。最後，再次感謝黃院士接受訪問。